

非机制光绪通宝钱 的特殊铸造法

■ 边晏 边玥彤

中国传统铸币经历了从硬范铸、软范铸到翻砂铸造的演变，其中传统的翻砂铸造法为人熟知。清朝光绪时期是中国铸币法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大变革时期，货币铸造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各自为政的问题愈发严重。在这种形势下，铸币的铸造突破了原有的请批部颁等规定。除近代化的机制铸法外，还存在多种非主流铸造法，主要包括母钱锉边减重铸造、母钱改字铸造、活字法的运用、铜合母钱的运用、子钱修整后翻铸下一代子钱、机制母钱的运用、以机制币作为母钱翻铸子钱、软范法的运用、夹铸法的运用等，部分方法属于新生事物。

一、母钱锉边减重铸造。
这种铸钱法较为多见,随着铜价的上涨,为节约成本,为减少私毁私销私铸等问题,铸钱局将母钱锉边后翻砂铸币。

二、母钱改字铸造子钱
母钱改字铸造子钱包括母钱挖字、去字铸造子钱。

三、活字法的运用
在宋钱的铸造过程中，如果某个钱文残缺较严重则需要将其替换，钱文的替换至少有一种采用鑲入楔形木字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木字嵌入后牢固性好,且木质在挤压下几乎不会在地章上留下痕迹。

五代十国时期，翻砂法铸钱已广泛应用，但地处闽南的永隆钱仍采用范铸法，这是经济规模有成形形下的铸钱选择，不过这对认识光绪钱的铸造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宝津局光绪通宝窄穿大型钱背上星版式存在星位差异，然而这种差异不太可能是不同批次的标识。毕竟制钱作为交易工具,并非艺术品,过于细微的差异在区分批次,明确责任时易产生不确定性，且当时的铸币工艺似乎难以达到后来机制币的精细程度，由此引发“点”使用活字字戳的猜测，即早期在较为硬挺的成型砂型上铸币，或许穿口上点和下点分别对应不同批次。但这种方法效率太低，在铸母的砂型上操作或在母钱上做标记更为合理，由此推测铸母级别可能运用了活字法。光绪通宝钱中屡见类似宋钱的活字法铸钱实物。例如，宝河局钱中即有钱文个别字压郭等现象;宝泉局千字文钱中有背“日”字上横、下横借用郭、穿的现象,以及有背“生”倒置于穿下的现象;宝津局千字文钱中有背“日”畸大的现象等等。

四、铜合母钱的运用
铜合法,即正面、背面采用不同制钱或母钱磨薄后用铆钉固定作为母钱进行铸钱的方法。铜合法始于汉朝,兴于南北朝,一直延续至晚清。光绪时期,不止一个造钱局使用这种方法(如宝津局、宝福局等),尤其是宝福局,实物例证多、版式也多,宝福局一些版式钱体上可见明显的铆钉痕迹。

五、子钱修整后翻铸下一代子钱
这一铸造方式导致同一版式系列钱币出现同比缩小的现象。

六、机制母钱的运用
机制母钱,即翻砂所用母钱,由机器特制而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任河南铸钱局总办兼官钱局帮办的韩国钧著有《铸钱述略》一书。该书中对宝河局用于翻砂铸钱的机制母钱有“模以砂成印,砂之模仍须用钱,钱必铜制,刻工甚费,铸字于钢是为母模，盖铜片其上垫以铅块尽力锤之,铅较铜弱,为锤所迫则铜片入钢之凹处即成字形,幕亦仿此为之,然后将两铜片合成一钱如印,印泥如雕画……”等记录。

七、以机制币作为母钱翻铸子钱
以机制币作为母钱翻铸而成的子钱涉及宝吉局、宝奉局、宝广局等。例如,宝广局的实物存在背左右满文宝广和左满宝右繁体字双广两种版式。

八、软范法的运用
软范法,即铸钱仍采用范铸,只是范为软质材料。

九、夹铸法的运用
夹铸法,即利用前端带有正反面反书钱文的金属大钳,以钳入铜液夹取成钱的工法。这种铸钱法尚有争议,有待进一步考证。这种铸钱法基本只用于私铸钱。光绪时期的私铸钱极多，其铸造也充分体现了民间智慧的力量。

同时，光绪通宝钱中存在类似于咸丰钱木刻版铸法的实物,红钱中也有疑似品种,尚需进一步研究确认。光绪时期,南方局还留存有铅质母钱。

此外,光绪时期存在大量手类钱,如河手云、河手津、武手泉、武手直、武手苏(六至七种版式)、武手南、直手武、直手津、直手泉、国手泉、国手东(六至七种版式)、福手河、福手泉、福手南、津手东(八至九种版式)、津手河(存疑)、津手晋、浙手苏、浙手广、苏手浙、东手津、沪手武(两种版式)、沪手津、沪手浙、泉手东、泉手昌、黔手云等,这些制钱的存在有力证明了当时局际交流的频繁性。

光绪通宝钱还有很多地方铸钱、特殊金属成分制钱、铸造趣味品及特殊的加工工艺实证，这些钱币都是研究铸造法的实物例证。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儒家担当精神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启示

■ 高锦霞 黄霞

一、儒家思想中担当精神的内涵

儒家担当精神的核心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体系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实践奋斗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激励人们在提升个人道德的同时,还要保持积极进取、永不止步的奋斗精神。它们二者共同构成了从个人修身到治平天下的道德指引与行动纲领,深刻诠释了儒家担当精神从个人修身开始,扩展到家庭管理、国家治理,最终指向天下大同的理想,彰显了儒家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胸怀。

(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儒家思想中“以天下为己任”责任意识的集中体现,它阐述了个人在不同层面所承担的责任。

1.“修身”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建构
“修身”是儒家担当精神的起点,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基础。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的“德”内涵丰富,既指向个人内在的修养,也涵盖外在的治国方略。儒家主张“修己以安人”,个人要以身作则,做到仁、义、礼、智、信,不谈人短、不矜己长,以宽容和理解对待他人。修身既是个人成长的需要,又是承担家庭、社会和国家责任的前提。只有个体具备高尚的个人品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才能发挥模范作用,在社会中树立良好形象,在国家发展中贡献力量。

2.“齐家”是家庭责任的传承与实践
“齐家”是修身的自然延伸,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之一。个体对家庭的责任不仅体现在对家人的关爱与照顾,更体现在对家庭价值观的传承和维护上。儒家指出“家和万事兴”,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论断,也确立了家庭作为责任实践初级场域的地位。个体在家庭中应承担起教育子女、尊重长辈、维护家庭秩序的责任,通过家庭的影响力,把良好的价值观传递到社会中,从而影响社会风气。例如,《颜氏家训》等典籍中就主张父母应以身作则,及早培养子女的孝心奉养,子女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要恭敬谨慎,悉心奉养。这些家规家训通过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家庭成员在家庭中践行这些伦理道德,也会把它们带入社会,并转化为具体行为规范,形成“家国同构”的责任传导机制。

3.“治国”是社会责任的践行与担当
“治国”是个人责任的进一步拓展。孔子提倡“仁政”,主张统治者要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关心百姓疾苦,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儒家把国家治理认为是统治者以“仁者爱人”之心施行德政的过程,如孔子所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种德政要求统治者不仅关注国家的经济繁荣,还要重视民生福祉,确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百姓则以“克己复礼”的理念把个人道德转化为集体行为,自觉维护公序良俗。从井田制“八家共耕公田”的互助实践,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赡养传统,儒家通过制度与伦理的双重规范,把社会责任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关怀。这些实践不仅强化了社群责任,激发群体责任感,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理智慧。例如,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凝练出治国之道不仅需要统治者的道德引领,更需每个个体以“匹夫有责”的担当投身社会。

4.“平天下”是家国责任的升华
“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标,也是个人责任的最终升华。儒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天下人应该共享社会资源,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个人在国家中不仅要履行公民的基本义务,更要以天下为己任,关注国家命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推动国家走向繁荣富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个人对国家责任意识的高度概括。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儒家思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朱熹将其释为“君子法天之刚健,自强不息”。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应当效法天的刚健不息,不断自我完善,积极进取,永不满足以现状。

1.“天行健”体现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天行健”体现的是一种永不停歇、一直向前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指自己努力上进,永不懈怠,形容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为对目标的坚定追求,不断提升自我,追求卓越和进步,无论顺境逆境都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凭借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各自领域中留下了不朽成就。孔子周游列国 14 年,哪怕被各国驱逐也不放弃传播儒家思想;司马迁忍辱负重,著成《史记》。

2.“君子以自强不息”彰显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君子人格的重要表现,是君子对理想境界的追求,蕴含着直面困境时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人生在世,必然会遇到各种挫折与困难,而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能够帮助人们在逆境中找到希望,在绝境中开辟途途。例如,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面对雪山草地的恶劣自然环境、敌军的围追堵截以及物资极度匮乏等重重困难,却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突破重重封锁,最终完成这一伟大壮举。长征不仅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更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意志,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永恒丰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军队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的现状与成因分析

(一)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多项实证研究揭示了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发展态势。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于 53886 份全国样本的追踪调查,2022 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综合指数达 86.03,在连续八年的调研报告中持续上升。区域性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趋势:王艳红(2024)对山东省 1411 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53.22% 的同学表示会积极践行责任担当意识,43.02% 的同学表示有时会将责任担当意识付诸实践。马甜月(2024)在内蒙古 6 所高校调研的 1045 份调查问卷显示,53.22% 的同学表示会积极践行责任担当意识,43.02% 的同学表示有时会将责任担当意识付诸实践。这三组数据虽存在地域差异,但大学生的担当意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二)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的表现

1.积极表现
多数大学生能清晰认知他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角色及应担当的责任,具备较强的责任意识,表现为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服务、主动帮助弱势群体,以及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奉献精神 and 法律意识,等等。例如,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会志愿服务部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开展志愿服务,帮助患者使用自助设备、引导就医,提升了医院的服务质量。

2.消极表现
少数大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在实际活动中行为偏向功利性和目的性,对不文明行为和困难群众不能及时主动提供帮助,以及在个人利益抉择时犹豫不决、缺乏担当勇气,等等。这些不足与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青年大学生的要求存在差距。

(三)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消极表现的原因分析

1.个人层面的原因
一部分大学生对责任的认知不足、缺乏挫折经历、自我中心意识过强,是导致责任感缺失的主要原因。例如,在团队合作中出现失误时,不是积极弥补,而是推诿责任或只追求个人利益。

2. 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原因
个人责任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家庭和学校的引导,一些家庭过于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忽视责任感培养;一些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不足,未能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例如,有些家长在孩子犯错时,总是为其开脱责任,而不是教育孩子勇于承担责任。

3.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对部分大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忽视了社会责任。例如,一些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只考虑个人经济收益,而忽视社会价值和职业的社会责任。

三、儒家担当精神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启示

(一)新时代大学生要做责任担当的引领者
1. 修身立德固根基
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新时代大学生应以儒家担当精神为指引,把“修身”作为提升道德素养的起点。通过不断学习、反思和实践,提升个人品德与综合能力,以高尚的道德修养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应以身作则,践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积极参与支教助学、生态保护等公益实践活动,把对道德的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为身边的人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

2. 崇德铸魂强自觉
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大学生需要进一步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体系。通过在实践中锤炼诚信品质、仁爱之心和奉献精神,大学生能够提高道德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

(二)新时代大学生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1.与时代要求结合传承儒家担当精神
在新时代,大学生应深入学习和理解儒

家的担当精神,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并结合当下的时代特点,对儒家担当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知识与技能,更加渴求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青年人才,大学生需要运用“和而不同”的智慧,把儒家的家国情怀与数字时代的协作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使儒家担当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在社会实践创新儒家担当精神
大学生在传承儒家担当精神的基础上,应积极探索创新文化实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为儒家担当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它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注入新活力。例如,浙江大学李铁凤教授团队研究的“自供电软机器人成功挑战马里亚纳海沟”项目,青年学生全程参与技术攻关,从实验室模拟到深海实测,将学科交叉的创新思维转化为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实践力量。他们以仿生设计与材料创新为突破口,借鉴深海狮子鱼的生存智慧,用耐压弹性体和自供电系统攻克深海能源桎梏。通过将仿生学、材料科学与电子工程深度融合,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硬壳对抗”到柔性仿生的范式转换,成功应对万米深渊的极端高压与未知挑战。这项成果既是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更是青年一代将个人志向融入国家战略的“时代答卷”。

(三)新时代大学生要做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者

1.参与社会实践实现价值统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新时代大学生把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相统一的关键路径。内蒙古工业大学的“铜芯圆‘1+3+N’”志愿服务项目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该项目以“笃行”为行动准则,把青年担当融入社会需求。通过“1”个同心圆核心品牌凝聚力、“3”支专业团队精准发力、“N”项特色服务动态延伸。青年学子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社会责任为动力,在助老、爱幼、支教等活动中传递温暖,在黄河流域生态守护中践行绿色发展。累计 500 余名志愿者、2000 余小时服务时长,覆盖数万人次的成果,在“笃行”的答卷上刻写下“强国有我”的赤诚誓言。

2.深度融合专业优势推动社会进步
在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基础上,大学生应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实现知识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结合。例如,人工智能专业学子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环境工程学子投身长江生态修复工程、法学青年扎根基层普法调解等,都是以“格物致知”精神践行“修齐治平”的追求。这些实践不仅需要技术知识,更需“仁者爱人”的价值关怀。只有将知识嵌入社会肌理,才能实现“致良知”与“行良知”的统一,构筑个人价值、国家命运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共生格局。

结语

儒家思想中的担当精神以其深刻的责任意识、崇高的使命担当和务实的人生态度,为新时代大学生提供精神滋养和行动指南。新时代大学生应当深刻领会它的内涵,做到知行合一,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

从“中国制造 2025”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欧阳志刚

蔡伟、章欣欣所写的《“中国制造 2025”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路径及统计监测方法研究》一书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系统构建了“政策路径——统计方法——实证检验——区域实践”四位一体的研究框架。该书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从研究范式创新、方法论突破、实践价值凸显和产业政策完善四个维度展开深度解析,重点探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机制、统计监测体系构建以及区域产业转型路径等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同时结合数字经济时代新特征,提出未来研究的优化方向。

一、研究范式创新:构建“双循环”分析框架

该书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产业研究范式,创造性建立起“政策培育路径—统计监测反馈—路径动态优化”的双循环研究体系。在正向循环中,系统梳理政府干预、要素集聚、技术依赖三大传统培育路径,总结提炼出政府引导模式、技术赶超模式、产业链模式等典型经验。逆向循环则通过熵权 TOPSIS 方法构建动态监测体系,形成“筛选-诊断-监测”的闭环反馈机制。这种双向互动机制有效破解了传统产业政策研究中路径依赖固化与现实反馈迟滞的困境。

在理论构建层面,本书创新性地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路径

分析;通过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视角,重新解构政府与市场在产业培育中的协同关系。特别是提出的需求侧导向与价值驱动双轮优化路径,突破了传统供给端主导的产业政策思维,将消费者效用函数引入产业培育模型,这在产业政策理论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创新价值。

二、方法论突破:统计监测体系的创新构建

在统计监测方法上,本书针对 DEA 方法的生产函数估计缺陷和 SFA 方法的假设限制,引入熵权 TOPSIS 模型。该方法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有效规避主观权重偏差,相较于 AHP 等主观赋权法,显著提高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其二,采用 TOPSIS 贴近度分析实现多维度效率评价,突破传统单维度效率测度的局限性;其三,构建“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四维监测框架,形成兼顾静态效率与动态潜力的综合评价体系。

实证研究显示,该监测体系对产业异质性具有良好识别能力。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监测结果精准揭示出整车制造效率低下(C 值 0.26)与零部件制造效率分化的结构性矛盾,这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年报(2022)》披露的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 58.3% 的现状高度吻合。这种微观企业效率与中观产业结构的联动分析,为产业政策精准施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三、产业及区域的实践价值

产业层面,本书基于 2017—2022 年面板数据,对 49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效率测度,得出若干重要结论:第一,产业效率呈现显著两极分化,效率极差达 3.76 倍,其中数字创意产业(C 值 0.92)与新能源汽车产业(C 值 0.24)形成鲜明对比;第二,空间分布呈现梯度差异,东部地区效率值(0.85)显著高于中西部(0.68);第三,要素配置效率成为关键制约因素,财务费用率每上升 1% 导致产业效率下降 0.37 个百分点。这些发现为理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注脚。研究证实了“适度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边界的理论。数据显示,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区间特征:当补贴强度低于主营业务收入 8% 时,边际效应为 0.42;超过 12% 后则产生挤出效应。这一发现为优化财政支持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 Aghion 等人提出的创新补贴“倒 U 型”曲线理论形成实证呼应。

区域层面,江西省的案例研究凸显方法论的应用价值。通过建立 R&D 强度、单位 GDP 水耗等 11 个指标的监测体系,研究发现:区域产业转型存在显著模式分化——昌九经济带适宜整合集群模式(综合得分 0.82),而资源型城市更匹配行业转型模式(综合得分 0.75)。这种差异化路径选择论证了“空间异质性-转型模式适配”的理论假设,为其他省份制定区域产业政策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